

## 《冀淑英文集》補遺

冀淑英

### 關於版本的鑒別

#### 一、怎樣認識版本

古籍是歷代相傳的，一部書刻印次數既多，就產生了不同的版本，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同志，需要有一定的版本方面的知識，能認識它是何時何地所刻；除了辨別版刻時代以外，還要盡可能地瞭解版刻源流，豐富版本方面知識。這樣，才能知道某一書的哪個版本比較好。如《鹽鐵論》的宋元刻本不傳，明代刻本有好幾種，其中以弘治涂禎刻本為較好。因為它在明刻中比較早，而且是照宋本刻的；在它以前有個前人稱元小字本的本子（實是明初本），雖較早，但品質不如弘治本。至於一種書流傳多或少的問題，在工作中積累一些經驗後也是可以辨別的。

通過學習實踐，可以逐漸認識版本，但入門後要能很好地掌握運用，也不是很簡單的事。

不同時代所刻的書，總會有刻版的時代特點，通過多方實踐比較，就能逐漸認識這種特點。正確辨別版本的依據，可以從書本身的這種時代特點入手，比如從字體看，一個時代寫的字有其時代特徵，刻的字也有一定的時代特徵，加上紙張、墨色，就可以較正確地辨別出不同的版本。這就是毛主席教導我們的“認識——實踐——再認識——再實踐”的反復過程。

前人說宋本早期多為歐字，稍後轉為顏字，這用於宋時浙江刻本比較恰當。浙本早期字體方正較長，以後字體趨向方形，近於顏體。我們從字形中可以看出不同時代、不同地區刻書的特點。四川刻本有人說近乎顏體，如北宋刻的開寶藏，字體較為方整，近乎顏體，而以後南宋時蜀刻本，則撇捺伸得比較長，就不似顏字了。福建刻書如北宋刻福州藏，大字，墨濃，字畫端重；南宋初期福建坊本就不同了，字體多似瘦金書之風（宋徽宗的字即是瘦金書，特點是瘦勁、清秀），以後又變成較圓的近乎顏體字。有人說福建刻本多柳體，可能是說具有瘦金體的某些特徵。

到元代，盛行書法家趙孟頫（號松雪）的字，當時多學趙體，某些元刻本字體圓

潤、秀氣，多是傾向趙字，這影響直到清代。但大多數元刻本並非趙字，有些是寫刻體，有些也近乎印刷體，如一概而論，恐怕也不符合實際。

元代許多書坊刻書，行密、字小，這風氣延續到明代。從元到明，書坊刻書多用俗體字，如“學”作“𠂔”之類。兩個朝代交替之間刻書之區別，有時也不能截然劃分，因為前一時代的刻書之風氣，到下一代時仍會沿襲。

明初刻本多是寫體字，嘉靖前後有復古風，刻書倣宋刻，版心由黑口轉為白口，出現近似印刷體的字。嘉靖以後，寫體字和印刷體並行，明朝還有些人用古體字或篆文刻書。

清初多用方整的寫體字刻書，乾嘉以後，逐漸多用方形字體，這是大概的風氣。

我們認識版本，主要是多看書，取得實踐知識；多看看參考書，取得間接知識。如一書有牌記，也可以它為標本，有與之類似的書即可參考。以前搞文物的人，也是以這種方法鑒定古器物。如兩書版式、字體、風格相同，基本上就可以此證彼，充實我們的認識。

## 二、認識版本的輔助條件

所謂輔助條件，即是不能單獨憑這一點作為決定版本的依據。但可以作為一個參考的條件。

### 1. 書籍本身的條件：

①紙張：目前我國還很少有人對古代的紙張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有的文獻中講到紙的名稱，未見實物。有些古抄本刻本的紙，又說不出名稱。我國老一輩藏書家在這方面給我們留下的知識也不多。

舊時代，紙是手工生產，其生產技術可能延續多年，沒有什麼改革。這樣，在相當長時間內紙的原料、質地差別就不大。並且造紙多是就地取材，同時期不同地區生產的紙，所用原料不同，紙也會不一樣，所以紙祇能作為一種輔助條件來看。

紙又是商品，可以流通，甲地所用紙可能是乙地所產。

三朝版書籍之紙，版是宋代，紙卻是印書時代的。

宋代蜀本、浙本常用的紙，以前稱白麻紙，福建印書多是黃紙，因為原料是竹子。有些紙時間一長就更變黃了。黎庶昌刻《古逸叢書》中有的影宋、元刻本，就有人把紙染了，冒稱宋本或元本。對於版本應注意這種情況。清刻本好一些的用開化紙，明刻本講究的用白棉紙，一般用毛邊、毛太紙，刻書字體的時代風格與所用的紙要配合起來看。

②刻工：也是一個輔助條件。宋、元、明、清刻本中，有很多帶有刻工姓名，或刻於版心下方，或書末，亦有個別書前或書後刻寫的，有的還有開局刻書人名單，這都可以作為參考。

用刻工鑒定版本時代，是一個有力的證據，但也要和別的條件結合起來看。這是因為刻工生產工具簡單，遷移方便，流動性大。一位刻工一生工作時期，可能延續三十年左右或更長一些，如知道他所刻一種書的具體時間，就可推知他所刻其他書的大概時代。解放後，在南京發現一部宋版《金石錄》後，定為淳熙龍舒郡齋刻本，即是據此

書刻工姓名，並證以其他資料而定。書中有刻工胡珏、胡剛、徐亮等，與故宮天祿琳琅藏《大易粹言》中刻工相同，《大易粹言》是淳熙三年舒州（安徽）官刻本。宋人洪邁《容齋四筆》卷五，提到《金石錄》一書說：“東武趙明誠德甫……著《金石錄》三十篇，……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歿後，潛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此《金石錄》無李易安後序與之相合。龍舒即舒州，遂定為淳熙龍舒郡齋刻本。

同一時代、同一地區的刻工，集中的資料多了，可以看出一些規律，但也須參考其他條件。

③避諱：亦是一個輔助條件，可作參考，但不能死看。

封建時代對帝王名字，要避諱，子孫對父祖名字，也避家諱（如陸游子刻其父書，“游”字作“游”）。避諱的方法是改變寫法，少寫末一筆，或換用另一字，如唐代避唐高宗李治之“治”，“治”改作“理”或“持”。還有避嫌名的，即同音字也要避。不同時代有不同避諱字，可以作為我們決定版本時代的一個條件，但不能作為唯一條件。如宋避“玄”，是避宋朝皇帝先祖諱，而清避“玄”字，則是避清聖祖玄燁（康熙）的諱，而且有的朝代避諱嚴，有時不嚴，如南宋初避諱不嚴，以後較嚴。或同一部書前不避後避的。清避諱自康熙漢名“玄燁”始，雍正、乾隆間甚嚴，恐怕是與“文字獄”事件有關。道、咸以後稍松。避諱問題可參考陳垣先生的《史諱舉例》。

## 2. 後加的條件：

### ①校跋：

古舊書常有前人校跋或批注，這對於決定一書是否應列為善本，也大有關係。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原書本來就夠善本條件，又有著名藏書家校跋，猶如錦上添花；二是原書一般，但有著名藏書家校跋，就可視作善本。以校跋作為衡量善本條件時，就必須慎重對待。校跋所以能舉足輕重，則因校跋內容，有它一定參考價值。校書總是根據較早較好的版本，進行校勘工作，經過校勘，補正了書中的脫文誤字，同時記錄了另一版本的特點。題跋一般都是有內容的，有的說明版本源流，或書的重要性等等。如題跋出自有名學者或藏書家手筆，更可珍視。這需要有專業知識，才能識別其跋語內容是否有當，值不值得重視。我們平時要認真深入學習，知識面要大。

校跋也有鑒定問題，著名藏書家或學者的校跋，常有人據以過錄在另一本上，因年久，分不出來，以致誤認為原校，其實並非有意作假。解決這個問題，祇有多看、多實踐，如何焯（義門）在康熙間是有名學者，他的校跋往往被他人或門生抄錄，因為都是同時人，書法風格或亦相似，所以後人講何焯之跋多數是假的，蓋出於此因，並不全是有意作偽。

以前藏書家盛稱顧（廣圻，字千里）批、黃（丕烈，字薊圃）跋。顧、黃二人是乾嘉年間著名的藏書家、校勘家，他們也出版刻印過一些書，他們是藏書家中比較突出的，見多識廣，鑒別能力既高，校跋之語就有分量，二人之題跋，早有人輯為專書，黃薊圃的叫《薊圃藏書題識》，顧千里的叫《思適齋書跋》。這兩書也可作參考書用。

### ②收藏印：

藏印所以值得注意，就因從收藏印，可以使我們知道一部書的收藏源流。許多著名

藏書家，都有書目傳世，我們可以通過藏印對照其藏書書目看，對一部書的鑒定，也會有說明的。但藏印也有真假，汲古閣、季滄葦等印章就有假的。看過某家真的藏印，可以比較辨別，認清真假。對假圖章，可從字體、篆法、印泥和蓋印位置等分析辨認，如汲古閣蓋印，有一定位置，不會亂鈐。

### ③著錄：

前人對於流傳的或收藏的書，往往寫下紀錄，編成專書，這對鑒定是很好的參考材料。要弄清每種目錄的性質和特點，才能很好地利用。如清代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在每種書下注出版本，可供參考，但所著錄不一定完全準確，因為他有些是沒見原書，照別的書目抄的。所以，我們查找工具書，還要看看它的作者，以確定其可信程度。

## 三、書和外界事物的關係

除書籍形成的時代背景外，外界事物，特別是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對書的影響也很大。如清乾隆帝以稽古右文為名，大徵天下之書，讓各省督撫、學政加意搜訪，委派一批官員開館纂修《四庫全書》。其實用意是要把當時流傳之書來一個大檢查，注意的重點，以乾隆帝屢次下的諭旨中，說得已很明白：“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又說：“明季諸人文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在銷燬之列。”所以在《四庫全書》纂修過程中，許多明代史料和反映民族思想的詩文集，有的被全毀，有的部分毀掉了。還有因人而毀的，如錢謙益、屈大均等人的書，都遭禁毀。從禁毀書目中，可見禁毀數目是可觀的。如果我們在編目普查中，發現有的書記載或涉及明末清初史實，就要查一下，此書是否入禁書目，如是禁書，應特別對待。這些可查《禁毀書目》和陳乃乾的《索引式的禁書總錄》。

在開館纂修《四庫全書》時，收到各省送來之書，一律在開卷第一頁正中鈐上翰林院方印，封面鈐楷體長方印，上記書名、冊數、何省何人送來。如有此二印之書，就可知其曾進四庫館。四庫館的修纂官們對徵進的書加以審核，決定取捨。選定後要撰寫該書提要。對選中編入四庫的書，纂修官審核時還要加以必要的刪改，這種刪改，包括對正文的刪削和改掉違礙字句，然後用固定格式（八行二十一字）抄寫出來。這些用過的書後來就稱為“四庫底本”。當時說用過的四庫底本都退還原藏書家，但不知認真退否。未選中的書，有些編入書目（也寫了提要）。對於存目之書，亦應同樣重視。清以來對四庫底本都很看重，因為收入四庫的書已被纂修官們刪改，從四庫底本可以看出改了些什麼內容，也就知道當時為什麼目的而改，這對史學研究者說是可貴的參考資料。如洪皓撰《松漠紀聞》的四庫底本還存在；洪皓在南宋建炎三年時，出使金國居留達十五年，回來後，寫了《松漠紀聞》，追記在北方時的見聞。此書編入四庫雜史類。這雖不是明清史事，但刪改也很多。宋代徽、欽二帝被金人擄去，宋朝人當時深懷國恥，對金人多稱作“胡”、“虜”，以至“犬”、“羊”，洪皓亦不例外，因滿人是女真族，曾自稱後金，所以間接地有礙本朝，纂修官就不能不改了。此書整段刪掉的有五處，如不看四庫底本就不知原本什麼樣子。

因為避諱，有的書名也改了。如四庫史部編年類有熊克《中興小紀》，《直齋書錄

解題》著錄作《中興小曆》，顯然由“曆”改“紀”，是避乾隆弘曆之諱。由於避諱，對著者名字有的也改了，如《徐霞客遊記》徐弘祖撰，改“弘”為“宏”。這些情況，說明纂修“四庫全書”對當時流傳的書籍有着什麼影響。當時除四庫館奏進的應毀書目外，軍機處和各省也有奏進禁毀書目，我們遇到明末清初詩文集和其他書，應查查《禁毀書目》，如已被禁毀，幸而流傳至今的書，就應加以重視。

#### 四、版本鑒定的有關常識

只講版本鑒定，孤立地解決這個問題，不一定解決得好，輔以其他一些條件，就可以把這問題解決得好一些。

①多學一點歷史知識。如關於朝代、年號、干支等，須要熟記。還有皇帝的廟號，大臣的諡號（如歐陽修稱“歐陽文忠公”）。封建時代是不能直稱其人之名的，某些人的字、號，就需知道。還有些特殊情況，如乾隆帝做皇帝六十年後，未死就讓位與嘉慶，自稱太上皇帝，宮廷中將嘉慶元年稱為乾隆六十一年。同治最早定的年號為“祺祥”，後改同治，但黃曆已刻出，故有乾隆六十一年至六十四年大統曆，祺祥元年曆書等。

②多懂一點文學常識。包括文學史。看看文學史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作家和作品，對於詩、詞、曲、散曲、雜劇、傳奇等，加深認識，分類時可有幫助。

③關於目錄學的常識。如分類源流，從《七略》到《四部》，清代四庫分類出現前後還有其他分類法，如孫星衍分二十幾類等等。

各家藏印與藏書家，我們如何熟悉它呢？可參看葉昌熾（清末人）的《藏書紀事詩》，是書體裁是把見於文獻記載的各藏書家各做一首七言詩，下寫此人簡歷和藏章印文、藏書情況等，對我們瞭解藏書家，很有幫助。

④我們在編目中遇到一些書，沒有確實依據可供確定其具體年代的，就可略寫為“宋刻本”、“明刻本”等。我們的原則應是詳其所詳，略其所略，不能沒有證據（充足）而加以臆斷。同時，我們要對目錄書有大略瞭解，這對編目查考也有好處。

（原刊《山東圖書館季刊》1982年第1期）

### 《中國大百科全書》辭條

#### 元大德九年陳仁子東山書院刻本《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

半葉10行，行17字，細黑口，左右雙邊，目錄後有：“茶陵東山書院刊行”牌記，首有大德乙巳（九年，1305）茶陵古迂陳仁子刊於東山書院序。此書開本版式獨具特色，每版框高15.3釐米，寬19.6釐米，紙幅寬大，每葉高約41.5釐米，寬56.2釐米，蝴蝶裝，元刻初印，現存宋元版書中，保存此種開本的，極為稀覯。

《夢溪筆談》作者沈括，字存中，錢塘人，寄籍吳縣，嘉祐八年（1063）進士，生於仁宗天聖九年（1031），卒於哲宗紹聖二年（1095）。《筆談》是沈括晚年見解和見聞

的筆錄，書中科學地記錄了許多當時中國勞動人民在工業、工程上的傑出發明，如布衣畢昇創造活字印刷技術、有關中世紀指南針的裝置方法、喻皓的建築技術、陝北鄜延境內的石油等等。《筆談》一書宋代舊有揚州刻本，乾道二年又重刻行世，陳仁子刻本前有乾道二年揚州州學教授湯修年跋，可知據乾道本重刻。《筆談》宋刻今不傳，現存以此本為最古，二十六卷全。

此書開卷有“東宮書府”及“文淵閣”兩朱文方印，當是元代宮出。明太祖朱元璋滅元得之，貽懿文太子朱標，後又歸宮中文淵閣。卷首有“雜部”朱文長方印，卷四及卷二十六後有“萬曆三十三年查訖”朱文長方印，當係萬曆三十三年孫能傳、張萱整編《內閣藏書目錄》、勘查群書時所鈐。明《內閣藏書目錄》後有“萬曆三十三年歲在乙巳內閣敕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題銜可證。而《內閣藏書目錄》雜部中，《夢溪筆談》不見著錄。此書清代中期為汪士鐘所有，後歸松江韓氏，繼為近代藏書家陳清華所藏，今歸北京圖書館。卷內有“平陽汪氏藏書印”、“汪士鐘印”、“臣文琛印”、“平江汪振勳眉氏印記”、“甲子丙寅韓德均錢潤文夫婦兩度攜書避難記”等印。1975年文物出版社據此帙影印行世。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

#### 范欽（1506—1585）

中國明代藏書家。字堯卿，號東明。浙江鄞縣人。嘉靖十一年（1532）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生平好學，性喜藏書，為收集圖書，遍訪藏書家和各地坊肆。當時鄞縣藏書家豐坊和范欽友善，豐氏萬卷樓藏書至富，范欽常至其家，從豐氏借讀，遇未見善本即借來抄錄。豐坊晚年多病，藏書頗有損失，後將藏書賣歸范氏。范欽又與藏書家王世貞互抄所藏，以增益之。由是，明代中葉以來，私家藏書遂以范氏天一閣為巨擘。范氏藏書不專注於宋元舊版，尤重當代資料。以藏明代各省地方誌，洪武、永樂以下各朝登科錄及各省鄉試、會試、武舉錄為一大特色，總計不下千餘種。明人著述、明代所刊明以前古籍，賴其保存者頗多。其收藏碑帖自周秦至宋元，總數有700餘通。范欽因收藏日富，迺建閣存置藏書。清乾隆間開四庫全書館，詔各省進呈書籍，范氏裔孫范懋柱進書638部，為當時藏書家之冠。《四庫全書》編成後，亦倣天一閣規制，建文淵閣等七閣貯之。

范欽撰有《天一閣集》32卷，有萬曆間家刻本。其校刻之書甚多，有《新語》2卷、《新序》10卷、《說苑》20卷、《孫子集注》13卷、《兩同書》2卷、《稽古錄》20卷。又有《范氏奇書》等。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

#### 黃丕烈（1763—1825）

中國清代藏書家。字紹武，號堯圃，或題堯夫，又號復翁。江蘇吳縣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舉人。納貲議敘得六部主事，旋即歸里。生平喜藏書，尤嗜宋本，自號佞宋主人。其書齋名讀未見書齋，又名士禮居。歷年購得宋刻百餘種，著名文士顧尊為其書室題名“百宋一廬”。

清代乾、嘉以來，在江南藏書家中，黃丕烈是重要藏家之一。他既廣搜異本，又精於鑒別，每獲一書，常詳加研討，或據以校勘，並撰為題記。在藏書、讀書、校書之餘，還刊有《士禮居叢書》，其中影宋刻數種，如影宋刻嚴州本《儀禮》、影宋天聖明道刻本《國語》、影宋刻《戰國策》、《輿地廣記》等，向為學者所重。光緒時藏書家潘祖蔭輯黃丕烈所撰各書題記為《士禮居藏書題跋記》6卷，有光緒十年（1884）潘氏滂喜齋刻本；江標又輯《續錄》2卷，刻入《靈鷲閣叢書》。其後繆荃孫、章鈺、吳昌綬又集南北各藏書家所見，輯成《蕘圃藏書題識》10卷、《補遺》1卷、《刻書題識》1卷，有1919年刻本。近人王大隆輯《蕘圃藏書題識續錄》4卷，附《雜著》1卷，有1933年王氏學禮齋刻本。黃丕烈對古籍版本及古籍流傳的重要論述甚有見地，是古籍收藏家和研究工作者的必讀參考書。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

### 楊以增（1787—1855）

中國清代藏書家。字益之、至堂，山東聊城人。道光二年（1822）進士，官至江南河道總督。生平篤好藏書，收集古籍數十萬卷，建海源閣藏之。又別辟宋存書室，專貯宋版舊籍，而以元刻及抄本、校本附之。子紹和（1830—1875），字彥合、鯤卿，同治四年（1865）進士，曾任翰林院侍讀。海源閣藏書之盛，為以增父子兩代相繼以成。清代乾、嘉以來，黃丕烈、周錫瓚、袁廷禱、顧之逵被稱為蘇州四大藏書家，以後，四家藏書相繼流散，多歸汪士鐘所有。汪氏書散，其中經史佳本，多為楊以增所得，長編鉅冊，多歸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自是清代藏書名家，盛稱“南瞿北楊”。楊氏藏書中以宋版四經四史最知名，其藏室稱“四經四史之齋”。四經為宋刻《毛詩》（今殘存卷十八至二十，共3卷）、《周禮》（漢鄭玄注，宋婺州市門巷唐宅刻本）、《儀禮》（漢鄭玄注，宋嚴州刻本）、《禮記》（漢鄭玄注，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本）；四史為《史記集解索隱》（宋乾道七年蔡夢弼東塾刻本）、《漢書》（宋蔡琪家塾刻本）、《後漢書》（宋王叔邊刻本）、《三國志》（宋刻本）。楊紹和撰有《海源閣書目》；又取所藏宋、元各本，詳記其行款、版式、評、跋、藏記，撰為跋語，成《楹書隅錄》5卷、《續編》4卷，傳於世。此書有光緒二十年（1894）海源閣刻本，1912年董康取此版補刊重印。紹和子楊保彝編有《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4卷，有1931年山東省圖書館鉛印本。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

### 瞿鏞（約1800—1864）

中國清代藏書家。字子庸，江蘇常熟人。歲貢生，世居罍里村。父紹基（1772—1836），字蔭棠，廩生，好蓄書，收藏多宋、元善本，兼及金石。瞿紹基藏書室名恬裕齋，收得張金吾愛日精廬與陳揆稽瑞樓兩家所藏宋、元善本，並汪士鐘舊藏，價值極高。瞿鏞繼承父志，復大力搜求，積書至10余萬卷，清代藏書家莫不盛道“南瞿北楊”。

瞿鏞編有《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24卷，於咸豐年間付梓，已成經部7卷，旋被毀，而鏞亦遽逝。其子秉淵、秉清延請季錫疇（字崧耘）、王振聲（字寶之）館於家，

任校勘之事，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秉清子啟甲始刻成行世。商務印書館編印《四部叢刊》時，曾選用底本，採用鐵琴銅劍樓藏書數十種。啟甲還輯印了《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一書，有1922年石印本。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

### 傅增湘（1872—1949）

中國近代著名藏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字沅叔，四川江安人。光緒二十四年（1898）進士，選庶吉士，光緒三十一年任直隸提學使，北洋政府時曾任教育總長。1922年退職居家北京。因所居名曰藏園，晚號藏園居士。

傅氏精於鑒別，收羅極富，藏書近20萬卷，多宋、元秘本及名抄精刊，畢生致力於目錄、版本、校勘之學，每見異書，輒取新舊刻本，躬自校讐，生平校書凡1.6萬餘卷，當世流傳珍本，幾無不過目。每讀一書，常為題跋一篇，敘版本之異同，辨字句之謬誤以及作者傳略、著書意旨，累積所撰題跋近700餘篇，題名《藏園群書題記》，於1933—1934年天津《大公報》排印，分為4集。又《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共6卷，也於1938年排印。又有《雙鑑樓藏書續記》，1930年傅氏自刻。1943年編有《藏園群書題記初集》8卷（傅氏排印本）。傅氏與近代出版家張元濟交誼甚篤。張氏主持商務印書館影印《四部叢刊》，選擇底本多與傅增湘共同商定，而底本借自傅氏者亦多。傅氏所藏珍籍有宋刻本《資治通鑑》與宋抄本《洪範政鑑》二書，因此命名其藏書之庫曰雙鑑樓，因是“雙鑑”之名廣傳海內外。1949年傅氏逝世，家人遵遺命以“雙鑑”及所校群書捐獻國家，今藏北京圖書館。傅氏一生為訪求古籍珍本不遺餘力，數十年間，足跡遍於大江南北，並及日本。所見皆筆於錄，其孫傅熹年加以整理，編成《藏園群書經眼錄》19卷，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傅熹年又整理《藏園群書題記》原初集、續集、三集各跋，按四庫分類法重編，為20卷，以傅氏《雙鑑樓藏書雜詠》和著述22篇附後，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

### 周叔弢（1891—1984）

中國民族實業家，圖書文物收藏家。原名周暹，字叔弢，後以字行。原籍安徽建德（今東至縣），1891年7月13日生於江蘇揚州市。1914年移居天津。1919年起，歷任華新紗廠、啟新洋灰公司等企業經理、董事。1949年後，曾任天津市副市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至六屆代表和第一至五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一至四屆、六屆委員和二屆常務委員，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等職。1984年2月14日卒於天津。

周叔弢一生經營企業所得，大都用來購買文物圖書，先後聚書達4萬餘冊。所得宋元精品甚多，此外還有活字本、歷代抄校本、批跋本多種。他曾從海源閣楊氏後人及其他途徑收得海源閣藏書55種。他以“自莊嚴堪”為藏書室名，又因曾獲宋刊《寒山子詩》，也以“寒在堂”名其室。

他收藏文物圖書，是出於對書的真知篤好，是為了保存一代文獻，也為了避免這些珍寶落入市儈之手，流到國外。民國三十一年（1942），他估計當時形勢，認為再收集

善本書恐怕不易，曾在手訂的書目中留下幾句給子孫的話：“數十年精力所聚，實為天下公物，不願吾子孫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內無事，應舉贈國立圖書館，公之世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他實現了這一夙願，先後多次把他和家族的藏書捐獻給國家。1952年將生平所收珍貴罕見的宋、元、明代的刻本和抄校本715種，2672冊捐獻給國家，今藏於北京圖書館。1954年捐獻中外文圖書3000餘冊，收藏於南開大學圖書館。1955年捐獻清代善本古籍2.2萬餘冊，收藏於天津圖書館。1982年將9196冊善本古籍和1262件文物全部捐獻國家，分別收藏於天津圖書館和天津市藝術博物館。他的這一崇高愛國行為，多次受到政府的表彰。

周叔弢博聞多見，精於版本鑒別。所撰題跋，散見在他的藏書之中，已輯錄發表的有《弢翁藏書題識》（載《文獻》叢刊1980年3輯）。周氏影印的書有《寒山子詩》、《孝經》、《魚玄機詩》等。他的藏書目錄有《自莊嚴堪善本書目》（1985）和《天津市人民圖書館藏活字本書目》（1981）。他捐獻的文物被編為《周叔弢先生捐獻璽印選》（1984）。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卷）

#### 趙萬里（1905—1980）

中國現代版本目錄學家。字斐雲，別署芸龕、舜龕，浙江海寧人。曾在東南大學從師吳梅研究詞曲。1925年到北京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任助教，在王國維指導下，研究史學、文學、金石、版本目錄、戲曲等。後為王氏整理遺著，先後編成《王靜安先生著作目錄》（1927）、《王靜安先生年譜》（1928）和《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1928年到北海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工作，曾任中文採訪組組長、善本考訂組組長、編纂委員、購書委員會委員和善本部主任，並負責編輯館刊，經常發表古書題跋和書評等文章。在此期間，還兼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和文獻館專門委員，並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和通訊研究員。同時還在北京幾所大學任教，講授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中國戲曲史、詞史和中國俗文學等課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趙萬里任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兼善本特藏部主任，對各地圖書、文物的調查、保護、收集和鑒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數十年間，趙氏遍訪南北藏書名家和各地坊肆，不遺餘力收集古籍善本，造詣頗深，著作甚豐。已出版的有《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1956）、《中國版刻圖錄》（1960）、《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1933）、《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1959）。校勘的書有《校輯宋金元人詞》（1931）、《元一統志》（1966）、《薛仁貴征遼事略》（1957）等。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

#### 四庫七閣

中國清代收藏《四庫全書》的7座藏書樓的總稱。《四庫全書》是清高宗弘曆下令纂修的一部大型叢書，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式開設四庫全書館進行編纂工作，動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歷時14年，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完成編纂和繕寫校訂工作。

北方四閣 《四庫全書》編成後，先是繕寫4部，分藏內廷四閣即文津閣、文源閣、文淵閣、文溯閣。四閣的建制倣寧波范氏天一閣藏書樓，建成時間則先後不一。最先建成的是在承德避暑山莊內的文津閣，乾隆三十九年（1774）動工，次年告成。其次為位於圓明園內的文源閣，乾隆三十九年繼文津閣之後建成。文淵閣建於紫禁城內文華殿後，乾隆四十年（1775）動工，次年建成。文溯閣位於盛京（今瀋陽）故宮，在四閣中建造最晚，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建成。四閣原為庋藏《四庫全書》而建，但文津、文源、文淵三閣建成後，《四庫全書》纂修尚未完成，閣中一時無書可貯，乾隆便下令“倣四庫書函之式，裝潢《古今圖書集成》全部，庋架排列”，在文淵閣等三閣內，各貯一部。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1782），第一份《四庫全書》繕寫告成，入藏宮中文淵閣。第二份全書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與《古今圖書集成》一起送藏盛京文溯閣（因文溯閣建造較晚，未能先入藏《古今圖書集成》）。第三份全書貯圓明園內文源閣，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陳設完畢。第四份全書於乾隆五十年（1785）運送承德避暑山莊入藏。四閣俱在宮禁之中，因稱內廷四閣。四閣所貯之書，主要供皇室使用。

江南三閣 乾隆四十七年（1782），高宗下令續繕3份全書，分藏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早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兩淮鹽政寅著領到頒貯揚州天寧寺行宮和鎮江金山行宮的兩部《古今圖書集成》，就曾奏請在行宮內，倣天一閣規模建造藏書樓，永遠寶藏。乾隆四十四年（1779）鎮江藏書閣建成，乾隆賜名文宗閣，次年揚州藏書閣建成，賜名文匯閣。兩閣各入藏《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閣中尚多空餘書格，後迺收貯《四庫全書》。杭州原有藏貯《古今圖書集成》藏書堂一處，便在堂後改建文瀾閣，乾隆四十八年底（1783）完工。江南三閣仍取法范氏天一閣而建，三閣入藏《四庫全書》，則在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五年（1787—1790）陸續運送陳列（因其間曾對全書進行全面復勘之故）。三閣之書正式頒發入藏後，乾隆明令“該省士子，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呈明到閣抄閱”，這樣江浙三閣《四庫全書》可以公開閱覽，在以後的半個多世紀中，發揮了“嘉惠士林”的作用。

書與閣的變遷 四庫七閣之書，迄今存毀各半。文淵閣書在辛亥革命後曾歸內務府管轄，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書由其圖書館保管，1933年隨故宮古物南遷，現存臺灣故宮博物院。文溯閣書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由偽滿國立圖書館接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歸屬遼寧省圖書館，1966年移交甘肅省圖書館。文源閣書於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焚掠圓明園時，隨圓明園化為灰燼。文津閣書於1914年運至北京，由教育部函請，1915年正式移交京師圖書館，今藏於北京圖書館。北方四閣的建築除文源閣外均保存完好。江南三閣中，鎮江文宗閣於道光二十年（1842）鴉片戰爭之役遭英軍破壞，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克鎮江，閣書同毀。揚州文匯閣於咸豐四年（1854）太平軍攻入揚州時，閣書同毀。杭州文瀾閣藏書在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二次攻入杭州時損失大半，後經丁申、丁丙兄弟搜集散失並發起抄補闕失部分，得復舊觀，今藏浙江圖書館。文瀾閣建築今屬浙江省博物館。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卷）

## 天一閣

中國現存最早的私家藏書樓。閣址在浙江寧波市。始建於明代嘉靖十一年（1532）。閣主人范欽（1506—1585），字堯卿，號東明，浙江鄞縣（今浙江寧波市）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官至兵部右侍郎。生平好學，性喜藏書，為收集圖書，遍訪藏書名家和各地坊肆。他常至萬卷樓從豐坊借讀，遇未見善本，即借來抄錄。豐坊晚年多病，藏書散佚甚多，遂將倖存圖書賣給范欽。范欽與藏書家王世貞也有交往，從王的藏書中抄錄了不少罕見之本。范欽收藏日富，迺建閣存置藏書。

天一閣是一座兩層樓房，上層不分間，通為一廳，以書櫥相隔，下層分為6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西偏1間安設樓梯，圖書全部貯於閣之上層，中間3間排列大書櫥10口，內6櫥前後有門，兩面放書，以便通風，後列中櫥2口，小櫥2口；又西一間，排列中櫥2口；東偏1間因近牆壁，恐受濕氣而不貯書。其書櫥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氣；櫥內置芸草以防蠹蟲。樓上前後有窗，以利通風，樓前鑿池，環植竹木。以“天一閣”命名。清代乾隆帝修《四庫全書》時，令各省徵集當地藏書，范欽裔孫范懋柱獻書638種，受到嘉獎。其後乾隆帝為了建閣貯藏《四庫全書》，曾派人到寧波察看天一閣的建築結構。後來建造專藏《四庫全書》的文淵閣等七閣，就是參考天一閣的規制修建的（見“四庫七閣”）。

范欽一生篤愛藏書，他收集圖書並不專注於宋、元舊本，也十分重視當代資料，所藏以明代各省地方誌，洪武、永樂以下各省登科錄及各省鄉試、會試、武舉錄為一大特色。地方誌中，有些是屬於邊遠地區如雲南、海南島等地的，都是難得的資料。此外明代學者的著述、詩文集，明代所刻明以前古籍，由天一閣保存下來的也很多。自清初黃宗羲登閣觀書並寫出書目後，清代學者登天一閣觀書並繼起編寫天一閣書目者先後踵接。閣中所藏碑帖拓本，至乾隆間由全祖望編成《天一閣碑目》。後來錢大昕和張燕昌又加整理，再編《天一閣碑目》，總數有700多通。

天一閣藏書之所以能保存久遠，是因為有一套嚴密的保管制度。范欽去世後，子孫相約為例，凡閣櫥鎖，分房掌管，禁止書下閣梯，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為保護藏書，立有禁碑，如“煙酒切忌登樓”等。范氏子孫都能嚴守其約，所以閣中藏書從始創至明代末年，一直保存完好，在私家藏書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天一閣藏書在明末清初之際，曾有一些散失。此後曾屢遭人為的侵奪，康熙初年，閣中所藏《明實錄》已殘闕大半。乾隆修《四庫全書》時徵去的600多種圖書，在《四庫全書》完成後，並未發還。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之役，英軍攻佔寧波，闖入天一閣，劫去《大明一統志》和地方誌數十種。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進駐寧波後，當地盜賊乘亂入閣，盜竊閣中藏書甚多，當時范欽後人范邦綏曾借貸贖回了一部分。最嚴重的是1924年上海一些不法書商僱傭盜賊潛入天一閣，盜出藏書約1000餘種。閣中原有藏書7萬餘卷，至此祇剩1.3萬多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政府十分重視對天一閣的保護工作，撥專款維修了藏書樓，修整了庭院和四週環境。藏書得到妥善保護，並陸續收回部分散失的藏書。當地一些私人藏書家也將自己的藏書捐贈給天一閣。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卷)

### 海源閣

中國清代楊以增、楊紹和父子的藏書樓，樓址在其故里山東聊城。楊以增(1787—1855)字益之，又字至堂。道光二年(1822)進士，官至江南河道總督。生平嗜學，篤好藏書。任江南河道總督時，正值著名藏書家汪士鐘藝芸書舍藏書散出。因汪氏藏書主要得自清代乾、嘉蘇州“藏書四友”(黃丕烈、周錫瓚、袁廷樞、顧之逵4位最知名藏書家)相繼流散的藏書，於是，黃丕烈等所藏宋、元精本，大半轉歸楊氏所有，長編鉅製則多歸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從而形成清代後期藏書家中的“南瞿北楊”的格局。楊以增之子楊紹和(1830—1875)字彥合，一字鰲卿。同治四年(1865)進士，任翰林院侍讀，繼承父志收集圖書。逢慈禧發動政變，八大臣中端華被殺，怡府藏書散出，楊紹和收購甚多。由於端華為怡親王胤祥裔孫，怡府藏書自胤祥及其子弘曉遞藏百數十年，多世間未見之本(因清初錢謙益絳雲樓藏書經毛晉和錢曾，徐乾學和季振宜先後收藏後，多歸入怡府)。海源閣藏書實際上是楊以增、楊紹和父子兩代相繼努力的結果。楊氏藏書中以“四經四史”最知名。“四經”為宋刻《毛詩》(今殘存卷十八—二十，共3卷)、《周禮》宋婺州市門巷唐宅刻本、《儀禮》宋嚴州刻本、《禮記》宋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本。“四史”為《史記》宋乾道七年蔡夢弼東塾刻本、《漢書》宋蔡琪家塾刻本、《後漢書》宋王叔邊刻本、《三國志》宋刻本。楊紹和將所藏宋、元各本詳記其行款、版式、前人跋識、藏印等寫為題記，編成《楹書隅錄》5卷、《續編》4卷傳於世，有光緒二十年(1894)海源閣刻本，1912年董康又取此版補刊重印。紹和之子楊寶彝編有《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有1931年山東省圖書館鉛印本。海源閣藏書後散佚，一部分珍本如“四經四史”等，現藏北京圖書館。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卷)

### 《中國版刻圖錄》

一部系統反映中國雕版印刷成就的大型書影圖譜。趙萬里主編。該書選輯中國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後歷代雕版印刷的書籍中有代表性的作品的樣葉，按刻版時代和刻版地區編排，展示了各個時代刻版印刷技術的發展。從中可看到同一時代在不同地區刻印的書在字體風格上的差異以及同一地區不同時代版刻風格的延續性。該書在刻版書籍之後，還增加了活字印本與版畫部分，各成系統。對所選之書，每種都撰有說明，內容為該書版刻特點、版本鑒定的依據、雕版源流、補版先後等，反映了編纂者多年來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研究成果。

該書由文物出版社以珂羅版影印出版，1960年初印，選書500種，有圖版662幅，用宣紙印刷300部。1961年增訂再版，選書550種，有圖版724幅，用道林紙印刷500部。所印圖版除原書過大者外，均依各書原版面大小印製，版畫中彩色畫面諸幅，以珂羅版套印，直追原書丰采，在中國近代珂羅版印書中可稱創舉。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卷)

### 《澹生堂藏書約》

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圖書保管規則。祁承燦撰。承燦，字爾光，號夷度、密士、曠翁。浙江山陰人。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歷官江西布政使司右參政。生平好古嗜書，治方畝之地爲密園，園內建澹生堂，藏書其中。其收藏圖書，不以宋、元刻版爲重，而以實用爲先。所撰《澹生堂藏書目》著錄圖書9000餘種，20余萬卷。藏書中當代史料甚富，內中祁氏抄校各書，多世人所未見，尤爲可貴。《澹生堂藏書約》爲祁氏子孫規定了保藏管理圖籍的方法，並勉以繼續收書、讀書；約文簡明，至今仍有可借鑒之處。文中說：“今與爾輩約，及吾之身則月益之，及爾輩之身，則歲益之，子孫能讀者，則以一人盡居之，不能讀者，則以眾人遞守之。入架者不復出，蠹齧者必速補。子孫取讀者，就堂檢閱，閱竟即入架，不得入私室。親友借觀者，有副本則以應，無副本則以辭，正本不得出密園外。書目視所益多寡，大較近以五年，遠以十年一編次，勿分析，勿覆瓿，勿歸商賈手，如此而已。”書後附以藏書訓略四則：讀書、藏書、購書、鑒書，期望子孫繼承其讀書、藏書之志。

此書傳世有明刻本，書中有萬曆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1613—1616）郭子章、周汝登、沈淮、李維楨、楊鶴、錢允治等人序，附刻“庚申〔萬曆四十八年（1620）〕整書小記”、“庚申整書略例”四則，書當刻於萬曆末年。抄本流傳甚多，清乾、嘉間鮑氏刻入《知不足齋叢書》，後繆荃孫刻入《藕香零拾》，又有《筆記小說大觀》石印本。1957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以此書與孫從添《藏書紀要》合爲一冊，排印流通。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

### 《藏書紀事詩》

中國歷代藏書家的詩體傳記及古籍版本目錄資料著作。共7卷，葉昌燾撰。始編於光緒十年（1884），完成於光緒十六年（1890）。葉昌燾（1847—1917）字鞠裳，江蘇長洲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曾任甘肅學政。他學問淵博，尤長於金石、版本之學。該書著錄自北宋初年至清代藏書家750餘人。對每一收藏家及其祖孫、父子、師弟等有聯繫者題詠七絕一首，並各加注文，敘述其人特徵，考證其生平及所藏典籍等故實。注文旁徵博引，資料豐富。據編者自序，其所採錄“自正史以逮稗乘、方誌、官私簿錄、古今文集”。凡涉及藏書家的材料，莫不廣事收集。因此，書中還包括了許多有關古籍版本、目錄、校勘以及刻書、抄書等方面的資料。對古籍藏棄源流、書林掌故等也多有反映。注文內間有編者考訂之語，並抒發個人見解，具有參考價值。

今此書傳世有2種刻本：①光緒二十三年（1897）江標在長沙刻版，編入《靈鷲閣叢書》第5集，是《藏書紀事詩》初刻6卷本。此本譌誤較多。②宣統元年（1909）編者又自加校對，有所增刪，編爲7卷，宣統二年（1910）自刻告成，是7卷本。第7卷所增內容，補入藏書家9人外，又增加換書、買書、鬻書、活字印書、書坊、書賈、寫工、裝訂工等若干人，保存了中國古代印刷、裝修技術資料。1958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據七卷刻本加標點排印出版，爲今通行本。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

## 《書林清話》

中國近代論古籍版本目錄的專著。共 10 卷，葉德輝撰。1920 年葉氏觀古堂刻 3 次修改本，1935 年其子啟倬編入《郎園先生全書》，又據此版重印。葉德輝（1864—1927），字煥彬，號郎園，湖南長沙人，光緒十八年（1893）進士，官吏部主事。

該書以筆記體裁系統地介紹了有關中國歷代雕版印刷書籍的各項專門知識。從書籍和版本的各種名稱，宋、元以來歷代官刻、私刻、坊刻的源流，各時代突出的著名刻本，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創始和傳播，歷代刻書的規格，所用材料以及工料價值的比較，印刷、裝潢、鑒別、保存的方法，迺至有關刻書、抄書、藏書、賣書的遺聞掌故，皆有論述。葉氏因見葉昌燾《藏書紀事詩》唯以藏書家為主，采掇資料亦多涉藏書家本人史實，故撰為此書，對版刻緣始、各代版刻特點、刻本得失，或一版轉鬻數人等均有探討，以補《藏書紀事詩》所未備。此書資料豐富，取材於歷代諸家目錄、題跋，兼及前代史書、筆記、文集諸書，條分縷析，又自加按語，多有卓見，在目錄學著作中獨樹一幟，是研究版本目錄學的入門之書。

《書林清話》一書，為撰者收書藏書經驗的總結。書中廣集博引，以取材豐富見長，不足處在其所引資料多據前人目錄、題跋，非盡出目驗，失誤亦所難免。該書刻成後，撰者復將以前採錄宋、元、明至當代說部、筆記中涉及刻書的資料，編為《書林餘話》2 卷。1928 年劉澹園排印《郎園讀書志》時，附後一併付印。1957 年古籍出版社印行《書林清話》，將李泂《書林清話校補》與《書林餘話》一併印為一冊，為今通行本。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

## 中國古籍版本鑒別

辨識、鑒定中國古籍以確定其刻印或抄寫的年代、版本源流以及其價值的工作。它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項重要的學術研究工作。中國古籍歷代流傳，數量極大，門類繁多，同一種書經多次翻刻、傳抄，版本繁雜，舛訛叢生，給後世利用和學術研究造成重重困難，因而古籍版本鑒別就成為不可或闕的基礎研究工作。從事古籍版本鑒別需要具備廣博的文史知識和版本學、目錄學知識以及長期的實踐經驗。

### 刻本書的鑒定依據

**字體刀法** 是決定版刻時代的主要依據。漢字是方塊字，不同時代寫字用的筆和寫法有所演變，刻工的操作方法與技術水準也隨時代有所發展，在字體結構等方面形成時代特點與差異。除時代特徵外，刻版印刷發展的地區還形成獨有的地方風格。從事鑒定工作，必須熟悉各時期、不同地方的刀法特色，掌握常人不易覺察的字體同異要領，從而得出判定。

**牌記** 為刻書標識。一般在書的卷尾，也有在序或目錄之後的，文字有詳有略，主要標明刻版年月及出版者。宋元以後多出現於坊刻本。元、明、清三代的私家、官府、書坊刻本使用較多，形成明顯可資查考的依據。但有些影刻、翻刻本也把原書牌記摹刻下來，所以要參照其他特徵加以辨析。

序跋 古籍大都有序跋。其內容多為闡揚本書著述的優長，記述刻、抄的經過和年代等等。鑒定者可從序跋正文及署款判定該書版本年代及真偽、訛托，從而成為鑒定古籍的依據之一，但須留意一書多刻時照刻底本的序跋以及抽撤刻書時的序跋的情況。

刻工 宋、金、元、明、清的刻本，常在書中鐫有刻版者的姓名。有的一部書的刻工多達數十人。刻工歷來受版本學家重視，從刻工姓名可瞭解版刻時代與地區，是最直接的依據。但明、清一些影宋刻本，也把原刻本刻工摹刻下來，容易造成誤認；同一刻工刻的書也有年代的不同。因此還須結合其他旁證以作出準確判斷。

避諱 封建社會用字最講避諱，有避帝王諱，有避家諱或尊者諱。元代不講究避諱，宋代及清代康熙、雍正以後避諱較嚴格。後世版本學家常以避諱字作為判定古籍大致時代的依據。但應注意翻刻、影刻本保留原書避諱字的情形。

行款版式 由於刻書時代不同，書的行款版式變異較為鮮明，雖有交錯、例外，但有基本規律可循，例如宋版書的書口（版心）多為“白口”，而元版及明前期版本多用“黑口”。對行款版式的鑒定歷來被視為重要依據之一。

紙張 關於印本和寫本書的用紙，前人沒有系統的調查研究資料可供參考，很多紙不知其名稱，而文獻中提到的紙又難以與實物相聯繫，鑒定時所能根據的僅是紙質的精細厚薄，顏色的黃、白或灰以及簾紋寬狹而已。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紙，紙質較勻淨，有韌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紙，有些紙質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南宋初期福建印書所用竹紙，質地細潤，紙色較白，但以後多用黃色竹紙，因而從宋、元到明代，黃紙成為福建印本的特徵。明代以棉紙為貴，棉紙有厚薄之不同，紙質細潤，白棉紙印書成為明代特色。明末出現了開化紙，紙質細白勻淨，清代以開化紙印書最名貴，連史紙、竹紙應用亦多。宋以後，還有用公文紙（公牘紙）和其他冊子、信札等舊紙的背面印書的，這些公文紙如載有年月也可藉以推斷印本的大致時代。總之，書籍的用紙是識別版本的一項依據，但要多作比較，因為有的書刻印於宋代，後世仍可用其書版再印，而區別初印本和後印本，祇能從紙張來判別了。

#### 抄本和稿本的鑒定

印刷術發明以前，古籍都靠抄寫流傳。印刷術發明以後，甚至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後，抄寫本仍在中國傳世古籍中占很大比重。歷代流傳的抄本，數量可觀，品質也參差不齊。抄本之外，藏書家的手寫本及學者的稿本更是古籍中的珍品。因此對抄本和稿本的鑒定十分重要。其鑒定方法，首先要從書寫字體的一般時代特徵入手，與鑒定刻本之刀法道理相同。有不少抄本標識較為明顯，很多藏書家傳抄的書都用印有專用格式的紙供抄寫。如明代祁承燦家抄本在版心下鐫有“澹生堂抄本”字樣；毛晉家抄書有一種黑格紙，版心下鐫有“毛氏正本汲古閣藏”字樣；清初曹溶家抄本所用紙的版心鐫字為“李曹氏倦圃藏書”，等等。這些標識是鑒定的重要依據。此外，個人書法的風格、書中的避諱字、作者的時代等等，都是抄本和稿本鑒定的依據。

#### 有助於鑒定的其他旁證

印章 古籍上蓋有某人的藏書章，說明該書曾為某人所藏。流傳久遠的，藏印隨之增多，可從中看出文獻收藏的源流。著名藏書家大多有書目傳世，由藏書章對照其藏書目錄有助於考核一書的版本。但藏印有真偽之別，有條件時，可將真偽藏印比較對照，

細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澤，加以辨別。

**批校題跋** 古籍常經前人批校題跋。題跋中常包含目錄學、版本學資料，對古籍鑒定有一定幫助。對待批校題跋應加分析，要以其本身品質、出自何人手筆，以及內容、字體來確定其可信程度，辨別其真偽。

**文獻資料** 各種文獻資料中有很多關於版刻的記載。一些書目、筆記中常有記述文獻著述、流傳情況。一些地方誌中的藝文志收有當地的刻書目錄。有些著述，如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十一，有《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一書中雖有王磐序，但並非元興文署刻本。這些都是有益的旁證。

#### 古籍版本的真偽

前人有關於偽書之說，是指某一種書假託為古人著作，不屬版本鑒別的範圍。當古籍作為商品買賣後，一些人為了牟利，通過種種手段，或把原書時代提早，或以殘本充作全本，以提高書的價值。明代就已出現冒稱宋版的情況。在鑒別古籍版本時，應時時注意作偽現象。作偽常見的手法有兩種：一是利用明清以來的影宋刻本或品質較好的刻本，去掉原書的序跋牌記，以充宋刻。如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史記》，是照宋本翻刻的。書中多處有王氏刻書牌記，多鏤於某一卷之末。去掉牌記不易察覺，常被充作宋刻。再如清康熙刻本《通志堂經解》中《經典釋文》及某些宋人解經之作，也被人冒充宋本，高價出售。二是在原書上加工作偽，常見的有以下幾種手法：①剗改原書版面，補刻另一書名。②剗改原書牌記，充作早期刻本。③剗改原書的目錄和卷次，或去掉目錄，以殘本充全本。④假作牌記。⑤染紙。

（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卷）

（作者單位：原國家圖書館善本組研究館員）